

Discussing
World

纵议天下

经济讲演录 张曙光 / 主编

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

天则十年丛书 盛洪主编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Discussing
World

纵议天下

经济讲演录  张曙光 / 主编

天 则 双 周 学 术 讲 演 系 列

天 则 十 年 丛 书 盛 洪 主 编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纵议天下:经济讲演录/张曙光主编. —郑州:郑州大学出版社,2004. 1

(天则十年丛书·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/盛洪)

ISBN 7-81048-801-5

I. 纵… II. 张… III. 经济学-演讲-文集
IV. F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2738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制

开本:635 mm×960 mm

印张:25.375

字数:341 千字

版次: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邮政编码:450052)

发行部电话:0371-6966070

1/16

印次:200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1048-801-5/F·24 定价:31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■ 前言

我们呈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,汇集了百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在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上所做的学术报告和讲演。

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7月26日,是一家非政府、非盈利的公众机构和民间研究组织。天则所成立不久,就创办了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,每两个星期定期举办一次学术讨论,到2002年底,已经举行了231期。本丛书中收入的论文,就是从这231期中精选出来的。

创办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的初衷,是要为学界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,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,使大家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,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,进而形成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,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,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。经过近十年的实践,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原来的设想,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已经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品牌。

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的运作方式是:每次邀请一位主讲人,就

某一问题报告自己近期研究的成果和心得,时间约一小时左右;同时请两位同行评议人,对主讲人的报告进行评论,时间半小时左右;然后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提问和讨论。如果言犹未尽,正式会议结束以后,还可以留下来继续交谈和切磋。现在,我们回顾和总结一下,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
一是论坛的开放性。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论坛,这集中反映在论坛参加者的来源上。我们每次主动邀请的人只有三四位专家,其中,主讲人来源分为三类:一部分是我们邀请的,一部分是别人推荐的,一部分是毛遂自荐,自己报名要求的。只要提供的报告达到一定水平,不论其身份地位如何,都可成为论坛的主讲人。因此,主讲人中既有著名的专家学者,也有名不见经传的“小人物”;经常出现“小人物”主讲,“大人物”评议的情况。出席论坛的其他人完全是自主选择和自由参与。我们提前一周将论坛的主题和主讲人的信息在天则网上发布,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前来参加,没有任何身份和资格的限制。因而参加的人既有专家学者,也有大学生和研究生;既有政府官员,也有企业界的人士;既有国外学者,也有驻华使馆的官员;既有一些常客,也有很多新面孔;人数一般保持在四五十人左右,少则二三十人,多则六七十人。开放性既是论坛学术定位的要求,也使主办者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,是论坛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二是论题的广泛性。在 230 余次论坛中,论题以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为主,约占 2/3 左右,同时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,包括法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史学、哲学和科学学等;时间和空间范围虽以近现代和国内问题为主,但上溯至远古,下追之未来,近及周边国家和地区,远涉欧美和世界各地;既有非常抽象的理论问题,如汪丁丁的“有限理性和脑神经元的可预期行为”,陈平的“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、多样性和复杂性——新古典均衡理论的危机和复杂系统科学的展望”,张岩的“华夏文明的肇始历程”,赵南元的“认知科学和广义进化论”等,也有重大的现实问题,包括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,如东南亚金融危机问题、俄罗斯危机和科索沃战争问题、南沙群岛和西藏问题等。而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所有重大问题,诸如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、财政金融结构和资本市场发展、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,三农问题、粮食问题和城市化的问题等,几乎

都做过讨论,有的甚至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多次。因此,从一定意义上讲,双周学术论坛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近十年我们走过的道路,也反映了我们的生存环境。

三是良好的学术氛围。在“双周学术论坛”上,演讲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出现,不代表任何组织和机构发言,因而,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,主办者不设置任何禁区 and 限制,不管其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如何,只要言而有据,言之成理,都可以在论坛上发表演讲。参与者也可以自由提问和发表评论,可以赞同,也可以批评,可以提供补充,也可以展开辩论,只要不是人身攻击,不是冷嘲热讽,什么话都可以讲。因而,论坛的气氛既轻松、自由、愉快,又紧张、活泼、热烈。有时,意见针锋相对,各不相让,论辩得非常激烈;有时,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释,相互补充,各得其妙;有时,不同学科的人参与讨论,相互启发,相互学习,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。因此,凡经常参加论坛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:这里是一块可以自由思想的净土。

目前,全国各地举办的论坛多种多样,五花八门,不可胜数,但真正能够坚持做下去的不多,有影响的更少。不要说举办频率较高的论坛,就是一年一次或者几次的定期和不定期论坛,也往往是雷声大、雨点小,虎头蛇尾。其原因在于,预期太高,目标过多,没有自己的特色。一些论坛以盈利为目标,开始时大张旗鼓,搞得轰轰烈烈,一旦无利可图,自然偃旗息鼓,关门大吉;一些论坛追求社会宣传和社会轰动效应,专门邀请名人、大官和各种媒体记者,在大宾馆大饭店举办,以上报纸上电视、进行炒作见长,而论坛讨论内容则在其次,长此以往,也难坚持;一些研究机构组织的论坛,也因无明确目标,随着人事的变迁,也忽冷忽热,有时过分密集,有时又长期停开。“天则双周学术论坛”既不以盈利为目标,也不追求社会轰动效应,而是老老实实在地进行学术交流。不论是名人,还是官员,到了这里都是平等的一员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论坛基本上都在天则所简陋的会议室中进行,似乎离开了天则所(中间有几次曾在所外举行)就没有了那种气氛。但我们对讲演的内容却有严格的要求,有人多次要求来做讲演,都没有安排,就是为了保证论坛的质量。正因为如此,论坛在平平淡淡中一直坚持了下来,有了两百多次的积累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。

在 230 余次论坛中,不能说每次都很精彩,但精彩的报告确实不少,而且绝大多数

报告的内容都是比较充实的,所以才能一直坚持下来。有个别主讲人的报告不够充实,但讨论却非常热烈,也相当深入,弥补了报告的不足。为了使读者能够分享,我们编辑出版这个集子。从 231 次论坛中选出 76 次,汇编成四集:经济学和经济问题两集,其他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一集,读书会和书评一集。丛书按论坛次序编排。

本丛书的编辑出版,既要感谢各位主讲人和参与者的积极参与,也要感谢天则所有职工提供的支持和服务,还要感谢郑州大学出版社和责任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,同时要感谢为论坛提供赞助的美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(CIPE)。

张曙光

目录

黄有光

从偏好到快乐——1

肖耿

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——23

樊纲

经济转轨中非国有经济成长的理论分析——61

刘小玄

产权、市场和效率——85

张维迎

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——97

周其仁

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——113

目 录

· 1 ·

胡景北

中国经济发展机制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思路—— 129

钱颖一

第三种视角看“转轨”—— 161

平新乔

银行微观经济理论—— 179

王志乐

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对中国企业的影响—— 201

李绍荣

交换经济的市场过程—— 227

陈平

弗里希幻想，卢卡斯谬见，弗里德曼“妖精”—— 253

陈惠雄

人本经济学与快乐—— 277

徐滇庆 耿健

中国的资本输出与输入—— 307

张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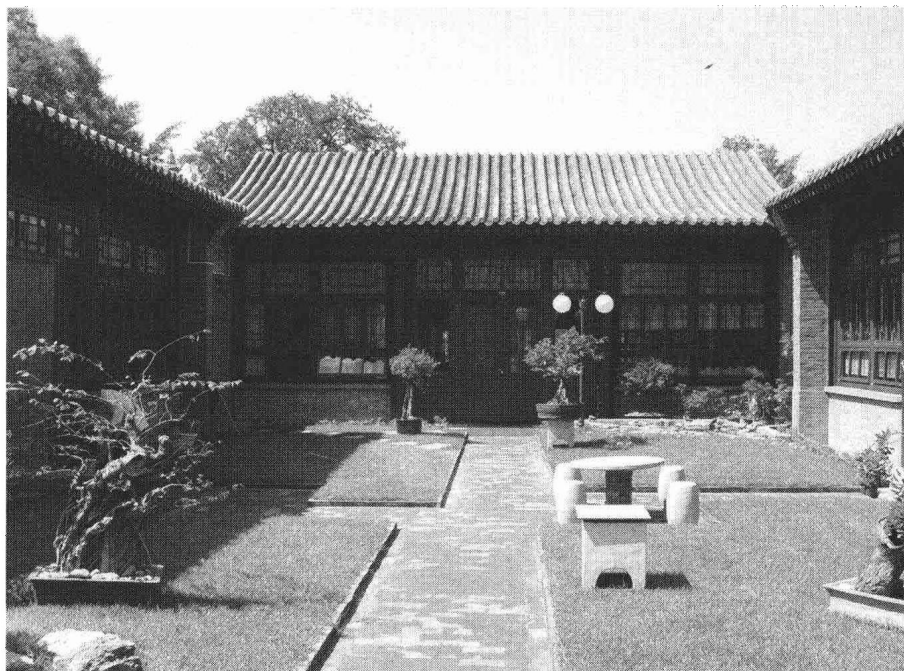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的最佳通胀率—— 329

薛澜

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：中国的案例—— 353

姚洋

对婚外恋的经济学分析—— 375



黄有光演讲场所外景

黄有光

澳大利亚籍华人经济学家,莫纳什大学教授



黄有光

从偏好到快乐

讲 演

我从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开始,就是搞福利经济学的,但是我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不完全的,因为它只探讨关于人们偏好或者效用的问题,而没有真正探讨福利或快乐的问题。偏好和福利是有差异的,我们待会儿会谈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福利,就会和只探讨偏好得出不同的结论。

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发展到现在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进程,就是开始经济学只探讨生产、消费、分配等比较客观的东西,然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研究偏好和人们的效用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,但是我觉得只研究偏好还是不够的,因为偏好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,就像生产和消费并不是我们最终目的的一样。生产和消费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用,但效用我认为还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,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福利,或者福祉。那么福利是什么?我认为福利就是快乐,如果不考虑时间长短可能造成的微小差异的话,幸福和快乐是一样的。而快乐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你工作可能是为了赚钱,也可能

从偏好到快乐

是为了给社会做出贡献,但为社会做贡献最终也是为了他人的快乐。所以我认为快乐就是终极的目的,要问快乐本身是为了什么的话,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,快乐就是为了快乐,无法继续追问下去了。那对自己来讲快乐是个什么东西?我认为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,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享受。但不是所有的感受都和快乐有关。我可以感到这个东西是青色的,但青色既没有让我高兴也没有让我痛苦,那么这就不属于心理学上叫做“affective”的东西,但快乐和痛苦就属于“affective”的,它会影响你,使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对任何词下完全的定义都是不可能的,所以讲到这里我想,每个人都知道有快乐有痛苦,享受不管是物质上的吃喝玩乐,还是精神上的,例如你的孩子成绩考得很好让你很高兴,都是快乐的;痛苦也可以是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。实际上痛苦和快乐都是精神上的,只是说造成痛苦和快乐的原因分为物质和精神的。所以,快乐的时候就是正的,痛苦的时候就是负的,因此在快乐和痛苦中间有个零点,上面的面积减去下面的面积就是一个人的净快乐。

但是有人说,我们经济学不是研究快乐的,这属于心理学、社会学研究的范围。对此我想,当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,同样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效用、偏好不是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,而是属于心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。这种自己给自己加上的限制,我认为是影响经济学分析的发展的。我这个观点同样也是个人的观点,不过我认为,从我个人的观察和跟朋友的交谈,以及包括我本人和其他人所做的一些研究,通过生物学的道理,都可以说明我这个观点不是特殊的,而是一般的、大家都持有的观点。我甚至认为,最终而言,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以快乐来衡量的。不过从这篇文章来说,你不需要同意我的这个哲学家会认为是极端的观点,只要同意我所说的快乐或福利、福祉是重要的就行了。

我们先谈偏好或效用与福利或快乐的不同。现代经济学是把效用代表偏好,而我用福利来代表快乐。所以有时我讲偏好和福利的不同,有时我讲效用和福利的不同,有时我讲偏好和快乐的不同,都是一样的。比较古老的经济

有时把快乐跟效用等同,但我现在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用法,把偏好和效用等同。而把偏好或效用同福利对立时,这二者主要有三点区别:

第一,当一个人“无知”,或者说信息不足的时候它们的不同。例如我以前有幸去樊纲家里吃饭,吃完饭后他驾车送我回家。我说现在坐出租车也很方便,他说的确如此,但当时他买这辆车时不知道现在会有这么多出租车,否则就不买了。那时他以为买了车以后会给他带来快乐,因为更方便了,所以当时他的偏好是买那辆车子;但事后却没有增加他的快乐,事实上他的快乐反而因为买车而减少了。这就是因为无知(众笑)。所以樊纲这种偏好跟他的福利是不一致的。由于无知或信息的不足造成对将来的事件不能完全预测、从而偏好和福利不一致的情形,是大家所公认的。

第二个使偏好和福利不同的是,偏好虽然可能大体上照顾自己的快乐,但在某些程度上他也可能会照顾其他人的福利。这就会造成不同。当然,如果你做一些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其他人有利的事,也可能会感到快乐,所以纵使是利他的情形,也不一定会带来偏好和快乐的问题。但是,当你捐一万块钱给慈善事业时,你自己的消费由于这一万块钱的损失所减少的快乐,如果大于你捐这些钱所带来的满足如社会地位的提高、别人认为你是个好人等时,才是对你快乐真正的减少。如果你认为虽然我的快乐减少了,但其他人的快乐增加了,这就会有差异。我在1999年一篇文章里曾经举例证明了这个差异确实是存在的。这是第二点。

第三,在无理性的情形下,偏好和福利是不同的。如果你偏好某样会减少你的福利的事情,但这种偏好不是由于樊纲这样的“无知”(众笑),也不是为了他人的福利,那么我就把它叫做无理性的。加上按此定义的无理性,就概括了所有的偏好和福利的差异。你可能认为这样定义无理性是可以争议的,但若是你接受了这个定义,那么这三个方面就概括了所有的差异。

有的经济学家谈及或接近过这个问题。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海萨尼,1997年就强调我们不应只看重偏好,还要避免无知的影响。还有的经济学家讲到,

即使经济增长很高,快乐也不见得高,应看到社会发展的社会成本。而对于会计的国民所得是不够的,必须考虑空气污染、环境等,有一些经济学者也提到这方面问题。经济学家一般都不考虑无知的情形,也假定人们是有理性的,这种简单的假定在许多情形下是必要的,而且使我们的经济分析能够得出比较明显的结论。但如果有一些无知、无理性比较重要的情况下,这些假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,因而就必须进行修正。

这篇文章所主要强调的是,在现代的物质主义社会里,就有一些天生的原因或后天影响——如广告、电视等,使人们倾向于过分追求物质、金钱上的东西,而忽视了其他一些对于快乐更重要的东西。即使不是生物学家,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,像蚂蚁、老鼠、松鼠这些动物,都是由本能来储藏食物的,这种本能使它们更加容易生存,在冬天或食物缺乏时可以用这些储藏来维持生命。同样的,我们人类也有这种累积物质的本能,而这种本能大体上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存的,就是说,我们物质越多,在困难的时候就越容易生存下去。但是,当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,我们所累积、储蓄的物质已经相当高了,这时候如果还继续累积物质的话,就可能会减少我们的福利。虽然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,例如西北乡下有些地区连温饱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,强调这一点有点超前,但我认为与其亡羊补牢、事后补救,不如未雨绸缪、事先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还有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全世界而言的,不只是针对中国的。另外,现在到处都有的广告,从电视到报纸、杂志,都鼓励人们拼命消费、买东西。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,就会使人们过分强调金钱,而忽视了其他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,使得人们对于更高的所得有不可满足的需求。例如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,问的问题是“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”,答案是,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。所以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下,人们永远不能得到满足。

那么我们不得不问,所得很高是否会使人们感到快乐?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所得和快乐的正相关是很低的。例如新加坡的人均

▲而且这只是证明一个相关性,而不是因果关系。可能的一个解释是,并非结婚使你更快乐,而是快乐的人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人跟你结婚。

所得是印度的 80 多倍,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也有 16 倍,但是它们的快乐水平刚好一样,而且都比日本和法国这两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高很多。还有其他一些指标。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可能是,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等。例如为什么在日本和法国的情形下快乐水平降低了?法国是因为戴高乐讲过一句话:“只有傻瓜才是快乐的。”所以人们在问及快不快乐(是根据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设计的一些指标,如问你是非常快乐、快乐、不快乐还是很快乐,或者用 0~4 的数据来表示等)时,不敢回答自己是快乐的(众笑)。日本人可能是因为跟华人有些类似,不愿夸大自己真实的快乐,所以往往只回答“还可以”。

下面我们再用同一个文化、同一个国家来比较。这一比较也说明了快乐和所得之间有一点正相关,但相关度很低。调查资料显示,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 2% 左右。而把所有的客观因素,包括人口学因素、所得、年龄、性别、种族、教育水平、婚姻状况等都加起来,也只能解释快乐的 20% 左右。若从这些因素再扣除婚姻因素的话,相关性就更低了,因为婚姻对快乐是有很大关系的。根据美国 1972~1989 年的调查资料,可以看出,结婚的人认为自己快乐的在 40% 左右,没结婚的只有 23% 左右,两条线相差很大。也就是说,结婚的人比没结婚的人快乐许多。〔盛洪:没结婚这条线好像是往上走的(众笑)。〕只有一点。而且这只是证明一个相关性,而不是因果关系。可能的一个解释是,并非结婚使你更快乐,而是快乐的人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人跟你结婚。所以结婚对快乐是重要的,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点(众笑)。研究婚姻对快乐的重要性,在所有的国家里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,即二者正相关。

另外,在所得很低时,提高所得得到的快乐较多;当所得达到一定点时,所增加的快乐就会减少。如果考虑到这种边际快乐随所得上升而下降的话,那么开始的消费水平不应太高,要逐渐改善来增加长期所获得的快乐。不过,如果一开始所得过低,也会影响快乐。比如会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影响他的健康,从而影响以后长时期的快乐。从这一点来看,有钱人的孩子与其说有“advan-